

26.08
1986.1-3 刻 (卷2-4 刻) 卷2

清水文史

QINGSHUIWENSH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清水县委员会

86年 《1》

26-05

1986年1-3期(卷2-4期) 2

清水文史

QINGSHUIWENSH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清水县委员会

86年《1》

录

禁

•

張

3

積

何

远

12

西

編

周恩来同志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举行的茶话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这是个别开生面的会，只请了年满六十岁的政协委员参加。陈毅和彭真两位付主席例外，他们是“候补老人”。我也只有到今年才敢召开这个会，因为今年刚过六十岁。陈毅同志喜欢用《秋江》里的一句台词，说过了六十岁又是一个新花甲。老道理新解，很好。

这几天我参加了政协分组会，见大家精神很饱满，在新中国大家都获得了新生。现在六十岁以上的委员有三百八十三人，占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还多。老年人占的比例很大也证明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扩大了。老年人得到了新生是可喜的事，但也要辩证地看问题。按照自然规律，人满了六十岁今后的日子总是比中青年人少一点了。有些人不服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有时熬夜多了就会出点小毛病。陈叔老也不服老，最近得了流行性感冒以后，才说服老了。老年人不能和充满生命力的年轻人比，但要做到人老精神不老。据说过去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四十岁。现在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也比旧社会好得多，大家精神愉快，长寿的人也越来越多。希望大家在新社会多活几年，多做事，即使多看几年也是好的。

在分组会上听了几位老先生的发言，很有感触，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谈谈工作年龄的问题。希望过了六十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这是从已故的程砚秋同志那里得到的启示。程砚秋同志的艺术修养很高，解放后在政治上和作风上也有很大进步，但总还是有点孤僻。在旧社会，他是孤身奋斗出来的，养成了洁身自好的习气，不大收徒弟，因此他的唱腔也就流传不广。解放以后，我曾劝他收徒弟。今年纪念他逝世一周年时，算了一下，他的徒弟不过十几个。程派唱腔又难学，徒弟们还没有学得好的，他就去世了，录下来的唱片也不多。从这个问题联想到，凡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总是多给社会留下一些东西好。

在座的委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具体工作岗位的，担任着科学、医药、工程、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这部分同志很忙，有的连写东西的时间也没有。老舍同志有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了我一“军”，要求给他安排些时间搞业务。对这部分同志要加以照顾，不要弄得太紧张。高龄的委员精力集中使用，工作的年头可以更长一些。到各地视察既是政协委员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但是要量力而行，有的可以不去，也可以就近视察。这次张文白先生提出在北京附近视察，我们就赞成。以后，可以把老年人组织在一起视察，少看多休息，不能和年轻人一样对待。另一种是年老体弱没有具体工作岗位的，但他们都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过去这方

面的工作组织得不好，没有能使他们的力量发挥出来。许多人在历史、科技、文化、艺术或其它方面是有研究的，如果自己不能动笔，可以带徒弟写点东西。

我们都是过六十岁的人了，至少是戊戌年出生的。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在座的都经历过四个朝代：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十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五四运动距今才四十年，那时候的事情现在的青年们已经不大了解了，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情况他们就更不熟悉了。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也很有价值。如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产生、发展和衰亡的。那些典型人物，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社会虽然灭亡了，有的本人也死亡了，但事迹可以作为史料记载下来。我国大小凉山有过半奴隶制，现在已经进行了民主改革。西藏是农奴制，再过几年也要改革的。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五四时代就提倡叛逆精神。一个人的转变不是偶然的。我如果有时间，也愿意

写点东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对袁世凯我不熟悉，谁要写蒋介石的历史，我还可以供给一些资料，两次国共合作我和他来往不少。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人们都赞扬我国的古代文化，其中就包括很丰富的历史记载，不仅有正史还有野史、笔记等。汉文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

顾颉刚先生说他想做些考据，但是政治运动很多，虽然有所得，却把时间都占了，在考据方面的贡献就少了。做考据工作只靠个人不行，要组织起来，也可以带点徒弟。

写东西不一定只限于文化史。在座的有搞军事的，可以写军事史，如从八旗、绿营、湘军、淮军、新军一直到国民党军队的发展史，都可以写。在座的还有不少工商业者，可以写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可以写其中的一个行业，如银行、纺织业等。其他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也都可以写。

政协是联系各方面的，要注意组织这项工作。全国政协要开常委会，成立工作组，其中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各位委员回去，可以利用地方政协和文史馆两个机构做做这项工作。在具体做法上要从容一点，不要象青年人那样，喜欢放“卫星”，也不要规定一个月写多少字，有精力的时间可以多做些。收集史料的工作一定要从容一点。

昨天有两个黄埔军校的朋友讲起三二〇事变和皖南事变，听起

采很有味，但我因有事只听了一个半小时就告辞了。有些朋友观点不一定正确，但可以共同研究，但先要把史料记载下来。例如昨天两个朋友讲的三二〇事变的情况就可以补充已有史料的不足。他们说，在事变发生前一星期蒋介石想走，乍一听不容易理解，这次事变是蒋介石向共产党的进攻，怎么他又想跑走呢？青年人听了根本不会相信，但根据蒋介石一贯的作风来看，这是可能的。蒋介石在陈炯明、孙中山手下时都曾拂袖而去。在黄埔军校时他同苏联顾问闹翻了，也是走了又请回来的。他当权后，这种事又有过三次：一九二七年下野去日本，一九三一年——二八淞沪抗战前躲回奉化，一九四七年和平谈判时退居幕后要李宗仁代总统。他常以退为进。三二〇事变前他可能想走，等到摸清我们毫无戒备的时候，就大举进攻。历史是曲折的。我早说过蒋介石是最好的反面教员。蒋介石这一集团是很有些东西可写的，在座的不少人熟悉这方面的情况。

今天梁思成先生没有来，康同壁先生来了，他们二位如果对维新派有兴趣也可以写。去年学术界对戊戌变法作了评价，也还可以重新估量。国外有专门研究戊戌变法的，但我国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很少。

现在先提一提这件事，大家好作安排，具体的组织工作由政协常委会秘书处与各方面联系。

上面这些话可能对六十岁以上的人有些用，所以就误大家不少时间。

周恩来同志在政协第四届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上的讲话纪要

记 录 稿

（一九六五年三月）

今天开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常务委员会，大会选出常务委员会后，一直未开会。徐冰同志说，一定要等我抽出时间来主持，因此，迟到今天才开。因为一个人的关系，就误两个多月。提议以后可请彭真付主席主持，他已答应了。如果彭真付主席没有时间，还有陈毅付主席嘛！总之，不能因一人而耽误会期。

搞文史资料是我提议的。到现在已出了五十一期。开始大家感兴趣，后几期就不好了，质量低了。有的内容有问题，甚至低级趣味、黄色的东西也出来了。思想不革命化，机关不革命化，资产阶级思想也反映到了文史资料上。

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要存真，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并不容易。在政府工作中，我的经验是：往往一件事，某人来讲如何如何，可是另一个人来讲又有出入，并不是那样。我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实事求是并不容易。苏北有个启东县，那里不仅是棉花高产，粮食也高产。那里土地不多，一百多万亩，其

中有一半种棉花。有一位同志到苏北视察归来说，那里人民生活好，但没有牲口，因为地处黄海之滨，是木网地区，水位很高，不能用牲口深耕，用人力耕。这个地方，人口很密，耕地少，劳动人民却能使它双丰收，粮食亩产一千斤，皮棉亩产一百多斤，值得称道。这么一个地方，用什么样的机耕设备帮助他们呢？考虑手扶拖拉机比较适合。最近启东县秦素萍（女）付县长来谈，情况不然。她说，解放后已做了改革，搞了大块台田，深挖了沟渠，降低地下水位到一米七八，已可以深耕七八寸，因此同样可以用牛耕地。这几年已有了不少大牲口，深耕还是增产措施的一条，所以那个地方可以保证高产。你看，我听了两个报告，就不一样，秦素萍自己管这个事，应该是第一手材料实在。

所以，我们调查研究可要注意第一手材料。调查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蹲点也不一定能取得第一手材料，不一定能抓到事物的本质，看你怎么蹲法，要走阶级路线，要走群众路线，同时要实事求是。比如：纺织工业，华东提出高转速，并不一定好，转动太快了，就会损伤设备，要大修。但是，对群众的意见，第一不能泼冷水，第二要实事求是。

文史资料也如此，不是任何稿子来了，不加分析，不加选择当然，我也不主张大改。不合适的，可退回请他改写。事实有出入的，可请几位有关的人一起谈谈。如果坚持不改，就保存起来，

不给他发表嘛！总之，要研究，要选择，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名称就有“研究”二字！

文史资料要搞好，这对以后研究历史有帮助。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最近好象好了一点，我看了一篇，还不错。讲的是袁世凯挟制熊希龄（字秉三）解散国民党的经过。熊希龄是袁世凯时代的所谓第一流人才，是内阁总理。他在承德的避暑山庄（是清朝廷的行宫），盗了一些古物，送给了姜桂题。姜是袁世凯的人，向袁世凯密报了，袁世凯就派许世英暗查此事，许向袁作了报告，果有此事，就写了材料呈报袁世凯。有一天袁世凯约熊希龄到总统府，熊刚到，就有外交使节来见袁，这是事先安排好的，袁就先去会外宾，叫熊到他的办公室稍候。熊到袁办公室，空无一人，只见办公桌上放着调查避暑山庄窃宝案的报告，熊一看，面色苍白。袁世凯进来，看见熊的神态，故意表示关怀的问他：你的脸色为什么这么不好看呀！接着就讲国民党怎么不好，我的意见必须立即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的议员资格，你看怎么样。熊当时内心惶恐万分，只好听从袁的摆布。袁马上就早已经准备好的大总统命令取来，熊希龄即签了字。熊一签字，袁世凯就传令在邻室等候的阁员进来，在上面签名付署。这就是袁世凯挟制他的第一流人物内阁总理熊希龄的经过。这可以教育我们的青年认识中国的封建政治。从《东周列国志》、《春秋》

《左传》看起，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三千多年历史，无不如此。其实，现在西方的政治，现代修正主义的政治也无不如此。赫鲁晓夫揭斯大林，苏共新领导一夜之间搞掉了赫鲁晓夫，还不是宫廷政变？肯尼迪被暗杀，至今查不出来，把封建政治揭露出来，对教育青年有好处。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治不是这样，光明磊落，当面批评，治病救人。希望民革的同志把蒋介石的事情写出来，要把旧东西揭露出来。

现在不仅要写旧的政治，旧的文艺也要写。文化部正在对非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事情要一分为二。如胡适是为反动派服务的家伙，但也有点贡献，白话文总与他有关系，这是一功。把他的白话文写出来，又把他的反动作官路线写出来，表示我们公正，对旧知识分子也有帮助。五四时代，鲁迅议论过，搞白话文运动有三类人，一种是为往上爬、做官，如胡适之流。第二种是继续革命，如李大钊、陈独秀。以后他们又走了两条路，陈独秀也不革命了，他是思想反动，行为不革命，并没有帮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做坏事，这比汪精卫当汉奸要略胜一筹。对陈独秀也可以写点，反面人物有教育作用。第三种是退隐，如鲁迅自己。后来，他经过“三·一八”事件以后，才逐步认识了应走什么道路。在《二月》序言，他还在动摇、彷徨中。他在序言中说，看潮着分三类：第一类是弄潮儿，勇敢地在浪潮头上航行，勇敢地领导革命；第二类是在高山之上观潮，

第三类是在走在沙滩上，生怕衣履被浪潮溅湿了。作者柔石是第三类，他自己是第二类，当然是属观潮的，还是《阿Q正传》的思想状况。他最后觉悟是靠两个方面：1.党内“左倾”分子大骂他，说鲁迅不懂马列主义，不懂无产阶级文学，逼得鲁迅读了马列主义。2.国民党的压迫，一九三一年大批文艺界同志的牺牲，教训了他要参加革命斗争。最后几年，鲁迅斗争很紧张，硬骨头，一直战斗到死。主席说他“晚节可贵”，对他评价很高。晚年失节，在封建社会都是不能原谅的。他是正面人物，还有这么许多曲折颠簸。

我们收集文史资料，就是要我们的同辈把遭遇写出来。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正面反面都要很好分析，不要以为出了选辑就完事。希望新的委员和办公室的同志有所改革，要对问题进行分析，争论一番，一分为二，对的、不对的对后代有教育。不要只给老人放在床头，睡不着觉看看。我看许多人看这东西近于消遣，这不利。我总想从里面得到点东西，如熊希龄的事，我看后就记得很清楚，用反面的政治史料提醒我们。文史资料对研究历史，教育青年有好处。总之希望你们革命化。现在出了五十一期，希望从五十二期起大有改革，以利后代。否则将作为废纸。两个前途：一为历史研究的材料，一为废纸。这是文史资料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因此事是我发起的，所以多说几句。

各工作组，希望多做事。

中央领导同志在政协第三次全国
文史资料工作会议茶话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乌兰夫同志的讲话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六大城市和三个县市的政协文史资料机构都有代表参加。中央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历史研究、新闻出版和有关高等院校，也有代表列席。这次会议是在打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恢复二年之后召开的。大家都把二年来的工作经验和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介绍和讨论，并且已经起草了一个《第三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纪要》。这种开会的方法是很好的，我首先对这次会议的成功表示祝贺。

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五九年倡议之下发展起来的，在十年浩劫以前，已经征集了很多宝贵的现代史和革命史的资料，现在继续从事这一工作。二十一年来，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所征集的这方面的资料，已有四亿余字，这是一批很有价值的史料。这些现代史和革命史的资料是通过人民政协这个统一战

线组织进行征集的，它既是历史资料工作，又是统一战线工作。许多老年的同志和朋友，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写成历史资料，贡献给国家，这就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贡献。文史资料工作很值得搞，希望同志们本着这次会议的精神，收集更丰富的历史资料，出版更好的史料书籍，你们的贡献就将会更加大些。

在人民政协搞文史资料工作，除了资料工作的学术性特点以外，它也和人民政协其它工作一样，在党与非党的关系上，要善于团结协作。许多非党同志，他们都能提供我们党员不曾亲历的历史资料。所以，在工作中要尊重他们的意见，善于同他们一起搞好工作，这样，会把文史资料工作做得更好。

这次会议提出重视收集少数民族的文史资料，这一工作确实很重要，有关地区的政协，可以通过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撰写回忆录等方法进行收集。我很同意你们这一建议。

我再一次祝贺这次会议的成功。

李维汉同志的讲话

在座许多同志，虽是熟人，但多年不见了。有的在反右斗争或在批判地方主义中受了委屈，我有责任，我借此机会向这些同志道歉。（王首道同志插话：我们大家向李维汉同志学习）这次会我没有参加，听说开得很好，很成功，我们表示祝贺。讲几点小意见：

一、在座的人都经过了十年浩劫，这十年经验，我们都是考取了的。在历史上及个人前途上，都是光明的。考取了，还不光明？有的同志心有余悸。我觉得，我们是胜利地考取了，不是因为犯了错误，不是叛徒、特务。我们不应怕，现在应站起来，应该挺起胸脯，站起来，捍卫社会主义，做好工作，把余悸丢掉，心有余悸，大可不必。

二、文史资料只有一条，就是按历史的本来面目写，不要问他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做到更好，但不要求都这样，只要写历史真实就行。人和事是相结合的，历史是曲折前进的，人也是在成功与失败中走过来的。能夹叙夹议当然好，不好议的话，叙述就可以了。希望大家思想更解放，更放手来写。犯了错误吸取教训就是了。准备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如果顾虑太多，就很难办。我们现在用的社会发展史是外国的本子。其实，中国的兄弟民族有几十个，他们都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的处于奴隶社会，有的处于封建社会，各省市都调查一下，都来参加，出点钱，把资料印出来，历史研究所就可以编个中国的社会发展史。这是一件大事。

三、再一个意见是写小人物，写无名英雄。有名英雄好找，没有无名英雄就没有有名英雄。我们要发掘无名英雄的资料。在座的同志各有千秋，经历过曲折的历史，写一百字也行，一千字

也行，几十字也行。如果没有地方发表，可以寄给我，找地方发表，文史资料选辑上大概可以发表。千万不要忘记无名英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

刘澜涛同志的讲话

开了个盛会，是十年浩劫后的一次聚会，也是在审判十年浩劫罪魁祸首时召开的一次会，大家是很愉快的，我们胜利了。

我们的历史是很丰富的。“四人帮”留下的血泪史，增添了历史家的任务。叫文化大革命史也好，叫十年浩劫史也好，这是一场大斗争。在这场大斗争中多少人牺牲了，粉碎“四人帮”的动力是人民，包括千千万万党员、团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他们起了历史的作用，归功于他们，发动粉碎“四人帮”斗争的领导人，也起了历史性的作用。历史是不能改造的，自然界能改造，社会能改造，人的思想意识也能改造。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不能随意改造，是怎样就怎样。写红军也好，写国民党也好，写北洋军阀也好，写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好，只要真实就有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这几个词都值得很好地思考一下。它是制造精神产品的工厂。这次会，作了一次检阅，产品合格，质量也很好。这是所有在座的老前辈、专家、工作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们文史委员会的第一主任是范文澜同志，他是著名的历史